### 财新网 | 田国强：解决经济失衡要改革 政府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过位”

### 田国强：解决经济失衡要改革 政府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过位”

来源： [财新网](http://www.caixin.com/%22%20%5Ct%20%22http%3A//economy.caixin.com/2016-12-23/_blank) 2016年12月23日 记者 张榆

改革的要旨是进一步明确和强化市场导向，以有限政府定位让政府在有巨大外部性的维护和服务方面大大有为，不能缺位；同时在市场能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方面大大无为，不能过位，为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提供制度基础

**【财新网】（记者 张榆）**“近年来[中国经济](http://search.caixin.com/search/%E4%B8%AD%E5%9B%BD%E7%BB%8F%E6%B5%8E.html%22%20%5Ct%20%22http%3A//economy.caixin.com/2016-12-23/_blank)持续下行，有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影响，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三个结构性失衡，即经济结构的失衡、体制结构的失衡和治理结构的失衡，这使得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的差距拉得越来越大。”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http://search.caixin.com/search/%E7%94%B0%E5%9B%BD%E5%BC%BA.html%22%20%5Ct%20%22http%3A//economy.caixin.com/2016-12-23/_blank)在近期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表示。

田国强表示，2017年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不明，尤其发达经济体中以欧盟内部动荡和美国总统换届可能引发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持续，使得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很难借助外力回暖。从内部看，三个结构性失衡依然会存在，即经济结构的失衡、体制结构的失衡和治理结构的失衡。

其中，经济结构的失衡是表象，表现为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转型滞后，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体制结构上的“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和治理结构上的“中央决议和地方/部门执行落差” ，没有形成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五位一体的综合改革治理。在旧增长方式后继乏力、新增长方式尚未建立的关键转型时期，内部和外部一系列新的不确定因素叠加，使得中国经济下滑的压力依然存在。不过，田国强也表示，如果改革到位、制度得当，中国经济有很大希望实现稳中有进。

根据上海财经大学高等学院最新发布的一份《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报告（2016-2017）》（下称《报告》）预计，2017 年中国宏观经济依然有较大的下行压力，预测在基准情景下 2017 年全年实际 GDP 增速约为 6.50%。同时，田国强表示，由于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增多，需要充分考虑各种可能性包括最坏的情况以便于前瞻应对和科学决策，课题组通过乐观、保守乐观、悲观（3种）、保守悲观（3种）等不同情景做了预测和分析显示，中国经济进一步下滑是大概率事件。

田国强表示，尽管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进入下行通道，但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在近些年差距过大，超过两个多百分点。能否减小这样的不正常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改革的成效。如果改革能够在短期内得到有效的执行及政策应对恰当，则在“十三五”期间，平均潜在增长率仍能维持在7%左右，从而实际增长率可以有一个接近潜在增长率的增速。相反，如果改革陷入停滞，则实际增长率将出现较大的下滑。

所以，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还是许多部门没有真正按照中央决议精神进行深层次市场化制度改革和应对当前的经济下滑。“没有解决是政府还是市场，是国企还是民企 ‘谁去做’和‘怎么做’的关键性、方向性问题，很多部门和地方政府大搞‘空对空’和形式主义，各种新概念和文件层出不穷，但是在执行过程中或者走样或者得不到执行，使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没有落到实处，改革的预期发展红利自然也就无法实现。中国经济要实现稳中求进，关键在于结构性的体制和治理改革，并切实强化改革的执行力，有效释放改革红利。”田国强表示。

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的真正关键在于结构性体制和治理的改革。“从长期发展来看，标本兼治的任务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制度供给的改革、能不能够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改革。”田国强表示， 改革的要旨是进一步明确和强化市场导向，以有限政府定位让政府在有巨大外部性的维护和服务方面大大有为，不能缺位，比如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市场秩序、财产保护，提供公共服务、环境保护、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等，同时在市场能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方面大大无为，不能过位，为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提供制度基础。

此外，2016年以来，企业债务违约报告数量大幅增加，超过2014年和2015年的总和。目前我国企业部门平均资产负债率为60.5%，这一数字并不算高，但企业债务风险正在迅速积累。

田国强表示，企业违约风险主要体现在投资结构扭曲，大量资金投向以房地产为代表的非生产性投资和虚拟投资。在宏观高杠杆难以消除的大背景下，企业投资结构扭曲导致相对稀缺的金融资源被十分低效率地配置，不仅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遏制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释放，还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需要及早防范。

他认为，目前市场化债转股政策正在逐步试点推进，以降低企业杠杆率和债务负担，推动改组改制，但需要警惕经营效率落后的“僵尸企业”借助这一政策转嫁债务风险。

就2017年人民币贬值压力来说，田国强认为年底前人民币贬值压力依然存在，但综观各方面，市场对于贬值的恐慌情绪已较汇改初期大幅下降，加上目前有一定程度的有效资本管制，人民币贬值幅度与步伐在短期之内仍然可控。

但他同时表示，人民币汇率也需要关注非热钱所引起的资本外流。根据《报告》指出，今年9至11月因游资引起的资本流出幅度基本持平，皆远低于2016年1月所面临的历史最高。然而，中国居民每年有5万美元的汇兑额度，保守估计只需5%的人口拥有汇兑5万美元的财富能力，就极有可能将外汇储备快速耗尽。